

中共建政 70 週年閱兵活動的官方論述策略*

顏瑞宏**

國防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摘要

本文旨在檢視中共建政 70 週年閱兵活動，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採取何種論述策略來傳達政治意圖。研究以講稿為文本，運用批判論述分析中的論述歷史取徑，考察文本中的自我指謂、認同召喚、他者建構、框架競爭與意識形態操作。研究發現，論述形構為黨的絕對領導、民族偉大復興及鬥爭重建秩序；主要以政黨為召喚對象，中國人民及臺灣均在論述裡「被消失」，最強烈的他者則是美國。習近平的反美演說動員了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民本思想及全球化論述等；港臺布局上則提出團結與和平框架，向民主制度進行鬥爭。而在鞏固政權的期待中，講稿內容則以虛假關係等四類論證策略來扭曲歷史，並藉著去價值化、去協商化、去延續性及再主權化的論述策略來建構所需的意識形態。

關鍵詞：閱兵、論述策略、批判論述分析、論述歷史取徑、意識形態

* 作者感謝銘傳大學倪炎元教授、世新大學胡光夏教授及國防大學傅文成副教授對研究方法、研究創意的啟發與指導；亦感謝兩位匿名評審斧正，惟所有文責由作者自負。

** Email: gnufather@gmail.com

投稿日期：2020 年 2 月 27 日

接受日期：2020 年 11 月 7 日

壹、問題意識與研究背景

201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建政70週年，中共自稱為「建國」¹，當日在天安門前舉行閱兵活動。官方指出，與國慶50週年、60週年與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等閱兵相較，此次規模相對盛大（孟祥夫，2019年8月30日）。活動由國家領導人習近平親自主持，但客觀環境卻是自其擴大集權以來最複雜的一次，內有經濟成長停滯及香港「反送中」運動方興未艾之憂，外有中美貿易對抗、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衝突、兩岸情勢險峻之患。

這樣困境主要是由中美貿易戰所形塑，並提升為全面性的經濟戰爭，涵蓋金融、貨幣、科技及外交等領域。經濟上開始出現滑坡，2019年第3季經濟成長率下探6.0%，創27年來新低紀錄；同年9月對美出口較2018年同期銳減22%，疲軟之勢連帶拖累製造業與外資活動，進口則呈連續緊縮（Bradsher, 2019, October 17）；對全球貿易順差總體雖較2018年增加20.1%，但對美順差下降8.5個百分點（Agence-France Presse, 2020, January 14）。此外，中共當局在經濟上的宏觀調控開始面臨更大風險，因為美國政府已全面指控中國企業竊取商業科技機密，開始加強風險審查，並將先進製造、輕量化武器、人工智慧等27項科技行業列入審查範圍，劍指「中國製造2025」（顏慧欣，2019）。

而在香港問題上，港人藉反送中示威，對中共現有體制發出挑戰。隨著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chael R. Pompeo, 1963-）會見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後，香港瞬間成為中美雙方在國家主權、政治制度、人權治理及民族主義等多個方面的角力場（Tao, 2019, July 13）。臺灣方面，在中美貿易戰及印太戰略催化下，通過美國對臺軍售的臍帶，近年來已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壓迫中共的關鍵節點（李宗憲，2019年6月7日）。這讓中共的對臺政策備受質疑，除內部民意有所怨懟外，兩岸關係也從「冷和」走向「冷對抗」（龔祥生、劉姝廷，2019）。

整體而論，經濟下行與港臺問題，激化了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對中共體制和習近平政權的穩定性造成衝擊。而美國要求中共將市場開放、核查及透明制度法律化，在習近平看來，這將對共黨專政體制形成挑戰（Friedman, 2019, August

1 1949年中共建政，當時播遷臺灣的國民政府將其稱為「僭政」；爾後依據兩岸分治的事實而以「建政」稱之。就兩岸現勢而論，屬於中性語彙；中共則認為「建國」，主張現代中國是其於1949年所建立之「新中國」，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僭政」、「建政」與「建國」等不同用語的揀擇，可以體現兩岸對中國史觀與繼承法統認知的差異，同時也凸顯了彼此在國際身分上的話語權爭奪。相關考證與討論可參閱辛灝年（2015）、葉駿（2019年10月3日）對這些詞彙承載史觀的辯證與論述。

27)。進言之，中美對抗屬於雙方內在矛盾自然升級的結果，牽扯了國家主權、經濟利益、政治體制、民主觀念等層面的衝突。

在這樣的環境下觀察中共閱兵活動甚具意義，因為閱兵將是習近平回應中美對抗形勢的論述場域。閱兵是威權國家的產物，旨在傳達執政者的政治意圖，是考察集權國家政策發展的指標。中共是標準的威權政體，習近平於 19 大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後，更加牢固了黨和自身的集權體制。因此，習近平在國慶閱兵典禮上的正式講話，即是政治訊息的製造與宣傳，亦是面向各方的權力對話及宣示，能夠作為觀察其政治意志與政策方向的有效標的。

目前有關中共的政治或政策研究，多數都偏重在國家安全戰略、國家發展戰略、政策評估、黨政軍關係、軍力發展及派系權鬥，較少探討領導人的公開論述。部分從官方會議切入的研究，多會受到會議屬性的影響，局限了研究的關照層面。研究主題甚少聚焦於大型閱兵這類題材，而閱兵卻是中共對內部、兩岸及國際社會均具指標性意義的論述場域。進言之，習近平在建政 70 週年閱兵的公開講話，展示了內部治理、兩岸關係及涉外事務的政策路線與意識形態，這些論述等同中共黨國體系的複製，承載了論述語境的使命、價值觀、世界觀與意識形態 (Weiss & Wodak, 2003)。為考察中共當局在內外交迫形勢下的政策重點與方向，本研究嘗試從論述策略視角，分析習近平閱兵演講，循批判論述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途徑，檢視習近平採取何種策略、編組來傳達政治意圖，並揭露其如何操作意識形態，藉以回答幾個問題：一、中共官方以何策略來形構論述？二、操作論述謬誤的策略與目的為何？三、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建構策略為何？

貳、閱兵論述的儀式觀與中共閱兵歷史的流變

一、閱兵儀式與傳播的儀式觀

閱兵儀式是一個有組織、有意義的符號象徵體系，這些符號及論述宣揚了官方意欲塑造的集體價值觀與精神。藉由刻意安排的隆重儀典、激情橋段，以及各種儀節控制所形成的通過儀式 (rites of passage)，讓群眾專注於特定的思想、價值觀與情感對象，經歷分離 (separation)、闖限 (limen) 及聚合 (aggregation)，循「結構—反結構—結構」過程，融入閱兵儀式再造的時空中，並從中獲得新身分，再以此回到現實社會，透過社會實踐再為閱兵儀式強化社會結構與秩序 (林柏州，2009；Turner, 1995；van Gennep, 1909/1961)。這種交融 (communitas)

關係能誘發歷史記憶與情感，使其併同儀式被牢記（李華君、竇聰穎、滕姍姍，2016），從而鞏固社會共識、政治認同與群體團結，聚變出對未來某種時刻的集體想像（王海洲，2008），為眾人提供政治方向及更大的歸屬共同體，民族與國族認同的建構於焉實現 (Nash & Scott, 2001)。

閱兵是對武裝力量進行檢閱的軍事儀式，同時也是一種儀式性傳播 (ritual communication)，能夠有效傳達或模塑共識與文化價值。整個閱兵操演過程就是國家機器製造和供給政治訊息的生產流水線（王海洲，2009），亦即通過特定論述對參演官兵、民眾，以及從媒體接收訊息的受眾，在認知、態度與行為上形成制約，讓閱兵成為強化或重溫集體記憶的記憶點 (memorial point)，而官方精心設計的論述則會轉化成民眾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林柏州，2009；Chang, 1997）。Larsen (2000) 也表達了類似看法，認為媒體在儀式性的傳播過程中扮演著煽動者 (instigators) 角色，會在大眾間建立起共享的情緒或精神狀態，藉以組織觀者、參與者的注意力及行為，從而協助構成儀式。

從上述討論可以掌握儀式的基本特質與作用。儀式具社會性，目的在使個人融入團體，並圍繞著一個神聖的組織或象徵性符號去聯繫彼此與展開互動 (Larsen, 2000)。這樣的交融過程可區分為自發性 (spontaneous)、意識形態 (ideological) 及規範性 (normative) 三種類型：自發性交融是指打破人類識別 (human identities) 的結構性界線，通過神秘參與感的相互聯繫，對儀式當下表現自我的人給予直接認同；意識形態交融係在複製自發性交融的互動經驗，藉儀式把人們聚集起來，使其重拾、共享集體記憶，從而完成認同或救贖；規範性交融則是促進交融的基礎，訴諸儀式中正式、強制的共識來凝聚個體間關係，並使其與團體連結，從而鞏固、延續社會系統 (Schechner, 2002)。

然而，將閱兵儀式及其論述視為一種傳播形式來看待，主要是基於儀式傳播的概念，但要理解閱兵儀式發揮作用的機制，就有必要以傳播儀式觀 (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作為理論指引，以考察閱兵論述的相關傳播活動。

傳播儀式觀由美國文化研究學者 James W. Carey 所提出，他將傳播觀區分為傳遞觀 (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 及儀式觀 (Carey, 1992)：傳遞觀基於功能主義、行為主義與效果研究的典範，指涉將訊息傳授 (imparting)、傳送 (transmitting) 或發送 (sending) 給他人的過程，具有地理和運輸上的隱喻 (metaphor)，傳播被視為出於控制目的的技術、過程與社會行為；儀式觀源自對自由資本主義的批判，基於庫利 (Charles H. Cooley) 的自我控制、米德 (George H. Mead) 的符號理論、高夫曼 (Erving Goffman) 的場景社會學，以

及文化研究的典範，指一種吸引人們以共同體或集體身分聚集起來的神聖儀典，亦是一個現實得以生產（produced）、維繫（maintained）、修正（repaired）與蛻變（transformed）的符號過程，具有儀式、神話的隱喻，傳播則被理解為在時間上對社會秩序的維繫、建構與延續。

與傳遞觀不同，儀式觀重視傳播對維持身分認同及社會關係的過程（樊水科，2011）。儀式觀認為，傳播活動並非通過傳送者的控制來發揮作用，其路徑在於群眾的神秘參與、共享文化、自我控制，以及彼此就儀式秩序（ceremonial order）所進行的相互約束（劉建明、徐開彬，2015；Goffman, 1957; Schechner, 2002）。Rothenbuhler (1998) 亦指出，儀式的過程與作用係建立在「儀式即傳播，傳播即儀式」觀點上，任何形式的儀式都是具有規範性的傳播機制，能夠約束參與者自律守規，而人們會在參與過程中構建自我、共享信仰。

依此觀點來理解閱兵論述，即可掌握在新媒體科技影響下，即便中共的宣傳控制屢受挫折，但其意識形態何以始終未被西方「顏色革命」所終結。換言之，看待中共意識形態鬥爭的角度須從傳播儀式觀出發，人們藉由共同理想的投影，以及對中共展示的物質形式體現，在社會中產生出人為（artificial）的真實符號體系，其作用不僅止於提供資訊或改變認知與態度，而在使民眾從儀式隱喻中確認（confirmation），讓社會基本秩序得以維持和延續 (Carey, 1992)。

按照 Hobsbawm & Ranger (2012) 的說法，閱兵是一個建構認同與記憶共同體（memory community）的過程，處於國家機器職責位置的菁英會依現實需要，通過歷史文化的回溯和現實感的強化，為社會培養共同傳統與歷史傳承，生產統一性的社會敘事，藉重複儀式灌輸特定價值觀與行為規範，發明（invention）出民族認同的集體記憶，創造共同政治想像，起到強化權威機構地位、提煉權力合法性、增進認同與說服、凝聚社會成員等作用（蕭阿勤，1997；Hobsbawm & Ranger, 2012）。於此過程中，愛國主義經常被用來製造群眾催眠狀態（mass hypnosis），以便各種象徵符號和論述得以有效運作，為主政者發展及維持社會秩序（王皓昱，1997）。

二、中共閱兵的歷史流變

中共自 1949 年建政迄今，一共舉行過 21 次閱兵活動。毛澤東主政期間的 1949–1959 年，每年舉行國慶閱兵，前後合計 11 次，後因文化大革命、中越戰爭（Sino-Vietnamese war）而暫停；1981 年鄧小平在張家口機場重啟閱兵，1984

年依託建政 35 週年之名恢復國慶閱兵，1989 年因六四天安門事件再次告停，迄 1999 年江澤民才又舉辦建政 50 週年閱兵，2009 年胡錦濤接續辦了 60 週年閱兵，至此定下「逢 9 才辦，10 年 1 次」的閱兵慣例（吳明杰，2019 年 9 月 30 日；許農合，1999）。

此慣例在 2015 年被習近平打破。自該年 9 月 3 日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週年閱兵後，習近平陸續主持了香港回歸 20 週年、建軍 90 週年閱兵，還有南海、青島海上閱兵（fleet review），以及建政 70 週年閱兵。上任至今閱兵 6 次，除稍遜於毛澤東外，已超逾鄧小平以降的各代領導人（李銀祥，2015 年 9 月 4 日；Blanchard, 2019, April 23; Chan, Lau, & Ng, 2017, June 30）。閱兵型態從典禮校閱到沙場、海上點兵，受閱部隊則在陸、空軍外，增列海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聯合保障部隊與維和部隊，折射出中共軍力發展、戰略外溢及國內外政治需求的變化。

此次閱兵是中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從鳴砲升旗、習近平講話、部隊校閱到「同心共築中國夢」群眾遊行，歷時 2 小時 40 分鐘（〈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閱兵儀式和群眾游行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並檢閱受閱部隊〉，2019 年 10 月 2 日）。校閱活動按閱兵式、分列式程序進行，依改革重構的聯戰軍力體系，編成 59 個方（梯）隊，總規模約 1.5 萬人、飛機 160 餘架、裝備 580 臺（套）（王智盛，2019）。所有武器裝備均為國產現役，40% 以上首次亮相，新型機占總數比達 31.6%，展示了連續作戰、快速打擊、減少接戰循環（engagement loop）的能力，以及部分已超越美國的高超音速導彈科技，標識著中共戰略核力量、常規力量的重大轉變（Bondaz & Delory, 2019）。

三、中共閱兵的內外形勢

習近平主政後，強力促進個人集權，催生新時代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敢於鬥爭的意識形態，以「中國夢」為目標，積極推進反貪打腐、軍事改革與一帶一路的戰略建設，但在國際上卻受到「中國夢」對撞「美國優先」的深刻影響。中共在此情勢下舉行閱兵，而與所處的內、外部環境則是呈現相互作用的辯證關係，一方面閱兵對專政合法性與權力宣展的論述，受到國際情勢及戰略形勢的結構性制約，另一方面習近平也在藉由閱兵論述，面向不同的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進行民族主義、國家認同、國際關係、知識與信仰體系的召喚、重複、固化及刻寫，以複製特定的論述秩序（order of discourse），發揮規訓、

控制、教育和宣傳作用，達到建構合法性、強固權力關係與模塑意識形態之目的（王海洲，2010）。

換言之，環境架構經常是閱兵論述的影響因素或限制因子（limiting factors），而閱兵論述則是基於維持或改變環境作用的實踐反應。因此，對於整體情勢的理解，可為後續分析提供考察脈絡的基礎，尤其此次閱兵係在內憂外患下舉行，與歷次重大的國慶閱兵有所不同（表 1），故有必要對閱兵當下的所在環境略做梳理。

「美國優先」是牽動閱兵所處情勢的主要因素。可回溯到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西部「鐵鏽帶」藍領階級助川普（Donald J. Trump）入主白宮，表達對就業機會外移和中國商品大量進口的長期不滿，反映出不再信賴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的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浪潮，以及對全球化公平性的追求（林竣達，2017）。而藉操縱貨幣、匯率及不當傾銷、補貼等手段損害美國利益的中共則首當其衝。

在美國支持中共加入 WTO 後的 2001–2017 年間，美中貿易逆差增長，全美蒸發約 340 萬個工作機會，工人集體損失約 370 億美元工資（Scott & Mokhiber, 2018）。社會氛圍推高美國優先的政策共識，川普（Trump, 2017）發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時，即將中共列為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與俄羅斯同為企圖改變世界秩序的戰略競爭對手（rival），美國亦開始針對中共結構性的產業補貼、侵犯知識產權，以及市場換技術、准入限制等國家領導的經濟計畫（state-led economic planning）展開抨擊與關稅懲罰（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美國優先」除反映在中國政策上，還同時表現在其他的經濟及安全戰略方面，包含放棄全球及多邊協定主導權的一系列「退群」行動²，以及要求盟邦提高安全軍費等（周暘展，2018；Taylor, 2017, October 13）。美國傾向保護主義、孤立主義的決策，引發國際間對金德爾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的普遍擔憂，此樣氛圍則給了中共反擊美國的支點（原倩，2018）。習近平用愛國主義和全球化效益展開說服，讓人們認知「美國優先」是美國人的利益，而「中國夢」是追

2 例如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等。

表 1：中共重要國慶閱兵內、外形勢分析表

變項	建政日	建政 10 週年	建政 35 週年	建政 50 週年	建政 60 週年	建政 70 週年
意識形態	馬列主義 反資反美	左傾思想 階級鬥爭 興無滅資	政左經右 改革開放	三個代表 與時俱進	科學發展觀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中國夢 敢於鬥爭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政治體制	黨的領導 政治協商	高度集權 民主集中 計畫經濟	黨政分離 集體領導 隔代指定接班 一國兩制	權貴資本制度	以人為本	個人集權 打破接班制度 取消主席任期制
核心事件	建政大典 兩岸分治	反右鬥爭 大躍進 823 砲戰	現代化建設 軍改整編	改革開放 20 年 香港回歸 美機轟炸中共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	改革開放 30 年 新疆烏魯木齊七五事件 首辦奧運會	反貪打腐 軍事改革 一帶一路
挑戰	未獲國際普 遍承認	經濟瀕臨崩潰 中蘇分歧 美援臺海	陳雲勢力掣肘 中英香港移交談判	南海爭議升溫 美中關係陷入低潮	維吾爾族抗爭 世界金融危機	習江權鬥 經濟滑坡 貿易戰 香港示威 兩岸冷對抗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求大家的、世界的利益（黃健群，2018），同時透過一帶一路及區塊鏈等去美元化布局，提供國際社會另一種超越金德爾伯格陷阱的「中國方案」戰略選擇（吳明澤，2016；李永峰，2019；楊增棟、杜成敏，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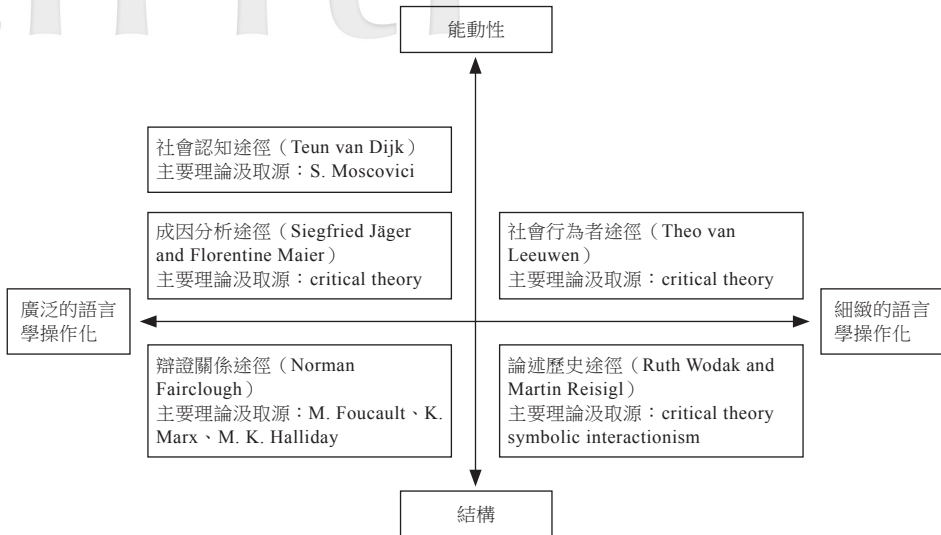
「美國優先」在與「中國夢」不斷博弈過程中，逐漸形成「圍堵抗中」局勢。川普於 2017 年 11 月東京峰會後，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提出印太戰略，建構出現階段壓縮中共地緣政治形勢的主要力量（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Tokyo, Japan, 2017）。在美國主導下，以印太戰略弧（Indo-Pacific strategic arc）對中共擴大圍堵（Rimmer & Ward, 2016），並藉軍售模式增加防務出口，提高聯盟軍事嚇阻與擊潰能力，用以反制中共軍力擴張；臺灣也在 2019 年 6 月被美國國防部納入《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與新加坡、紐西蘭、蒙古國被認定是印太地區四個值得信賴、有能力且為天生夥伴的國家（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

中共為求突破，除在世界各地尋求關節要點設置軍事或中繼基地外（曾復生，2018 年 10 月 25 日；謝英傑、謝志淵，2018），亦傾力發展高科技武器，縮小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差距，積極提升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然而，從美國優先到印太戰略，各種威脅的直接或間接作用，讓中共深陷經濟滑坡、權鬥增溫、貿易對抗升級、香港民運挑戰治權及兩岸冷對抗加劇等形勢，政治與國家利益發展空間遭到壓迫。可以預知的是，習近平勢將透過閱兵演說借力或突圍。

參、研究途徑與分析策略

CDA 的學派系譜可區分為語言學、社會心理學及社會學等三個領域（倪炎元，1999）。各個研究取向在語言與社會關係的假設上，採取了不同的中介途徑，對論述主體性的認識有宏觀與微觀之別，分析單位則可區別為個人心理認知及社會結構等類型，而分析操作涉入的語言學程度，從語言、語用到論證，亦有廣泛及細緻的差異（Wodak & Meyer, 2009）。基此，CDA 至少包含論述歷史取徑（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社會認知取徑（sociocognitive approach, SCA）、辯證關係取徑（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oach, DRA）、社會行為者取徑（social actors approach, SAA）、成因分析取徑（dispositional analysis approach, DAA）（Wodak & Meyer, 2016）（圖 1）。核心概念均聚焦在社會論述中的權力、

圖 1：CDA 各類研究途徑的語言學及結構化程度象限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 Wodak & Meyer (2009, pp. 20-22, 2016, p. 20)。

正義、意識形態、政治經濟與文化變遷 (Reisigl & Wodak, 2016; Wodak, 2014)，惟因各自的流派和取徑差異，主要的研究視角及操作方法則有不同。

目前國內運用 CDA 的研究大致有三種類型：其一是探討理論流派、背景及操作策略，如倪炎元 (2012) 檢視 Fairclough 的理論定位、內涵與應用問題，梳理出可供研究參用的若干分析策略；其二是方法建構或應用探索，如王雅玄 (2005) 將 CDA 從論述理論的討論延伸到方法論的問題，針對教科書的分析架構，重建出一個可行的研究模式；其三是直接就文本進行分析，諸如部落主題競賽得獎作品 (姚竹音, 2016)、《賽德克·巴萊》小說 (紀乃淳, 2013)、太陽花學運時間的總統發言與經濟部官網內容 (倪炎元, 2017)、《大尾鱸鰻 2》電影劇情與導演發言 (黃之棟、朱容萱, 2019)，以及媒體對白玫瑰運動、東南亞新二代的新聞報導等 (王孝勇, 2012; 李美賢、闕河嘉, 2018)，多數關注種族及社會運動議題，常以揭露語言權力、身分認同和社會意識為旨趣。

整體觀之，國內研究較少以 CDA 分析國家階層的政治論述，閱兵儀式這類具高度政治意涵的議題則付之闕如，研究視野難及國家認同、國際對抗、政治權力運作及國家意識形態等面向。而本研究旨在揭露中共如何透過閱兵論述建立國家認同、政治記憶與抗敵想像，並藉意識形態操作，持續進行召喚與復刻，讓專政權力的合法性反覆獲得確認及維持，故能補強論述研究在此環節的闕短。

國內學者倪炎元（2018）、林東泰（2019）在綜理 CDA 各學派的論述理論與分析架構後認為，維也納學派 Wodak 的研究策略從政治論述出發，最適合用於意識形態及政治行動領域的分析。本研究以閱兵論述為題，涉及政治認同、身分召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等非常複雜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衝突，故採 CDA 的 DHA，參照 Wodak 在處理當代認同政治、操縱與說服特徵診斷、謬誤批判及意識形態除魅所提示的操作架構進行分析。

DHA 在分析文本時，必須關注三個面向：首先是確定文本論述的核心主題，並沿主題向外推斷；第二是指出命名及調語策略；第三是針對論述主張及其操作合理化的謬誤進行論證，從條件句（假如 X，那麼 Y）或因因果形式（Y，因為 X）的論證架構中（argumentation schemes）識別出論者用來聯繫、合理化結論的策略或結論規則（conclusion rules）(Reisigl & Wodak, 2009)。實際操作上，Reisigl & Wodak (2001) 在一個針對種族歧視與反猶太主義的論述研究中，提示了五個 DHA 的論述策略及其作用；另也在《批判論述分析方法》(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一書中，指出了各個論述策略的具體分析指標 (Reisigl & Wodak, 2009) (表 2)。

對 Wodak (2001) 而言，DHA 的分析策略和純粹語言學不同，不僅汲取了語言學的功能分析和語境分析，同時還援引後結構主義的論述分析觀點，故其分析途徑屬問題取向，並非單純固定在語言學單位。進言之，DHA 將語言從攜帶意

表 2：DHA 論述策略分析指標

策略	目標	分析指標
指謂／命名 (referential/nomination)	對社會角色、客體／現象／事件，以及過程／動作的論述建構	如何命名、分類；隱喻、轉喻或提喻；用以表示過程、動作的動詞和名詞
調語 (predication)	對社會角色、客體、現象、事件／過程及動作的資格歸類評斷	如何給予刻板印象；使用哪些調語、介詞、述詞、分詞及構句；明喻、隱喻或其他修辭；有何引喻、召喚及預設／暗示
論證 (argumentation)	對真理、規範的辯護和質疑	主題為何；有何謬誤；如何將排斥、歧視、壓抑他者的論述合理化
觀點、框架或論述再現 (perspectivation, framing, or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言說者的觀點、位置及其與論述對象的距離	直證或間接的觀點策略；標籤與論據的表達角度或框架；是否引自他人；有何隱喻手法
強化或淡化 (intensification or mitigation)	論述力道的增強和減輕	論述是否被削弱或強化；用何模式表達？語助詞、標籤問題、虛擬問題、猶豫或模糊表達；誇飾或輕描淡寫；是否以非斷言式的疑問句間接表達行為；表達感受與想法的動詞為何？

資料來源：Reisigl & Wodak (2009, p. 95)。

義系統的符號組合轉而視為各方勢力競奪的體現，分析指標不僅關注文本的語言學形式，還須跳脫語言學單元，追問形構一組論述的陳述（statements）為何，以及論述所承載的社會衝突、矛盾與權力關係為何（倪炎元，2018）。

用 Wodak 的話說，論述是一組與社會脈絡相互依存的符號實踐，而 DHA 就是在還原與重建脈絡，分析過程須從微觀到宏觀層次，涵蓋文本的語言學分析、論述形式間的互語性分析、語言外在鏈結的社會變項，以及論述實踐所涉入的社會、政治、文化與歷史脈絡等鉅觀情境；進言之，除了辭彙、句法的功能分析，從語言學延伸的語境分析，以及語言和語言、非語言間的互語性分析，或是非語言學的實踐等，全都屬於 DHA 的分析範疇 (Reisigl & Wodak, 2009)。

本研究主要針對中共官媒新華社發布的習近平講話稿進行分析，首先針對文本中的陳述進行識讀，將指向相同對象、採取相同陳述、運用相同的概念群組及聚焦相同主題的陳述聯繫起來，提煉出多組具有特定功能的「論述」，再直接檢視編組成各個論述的陳述，關注其語詞、句法、語意、論證所再現的意涵，特別是針對意識形態操作的部分，如自我指謂、認同召喚、他者建構、框架競爭等，以揭露演講中的論述形構、策略、謬誤及政治意圖。具體操作步驟係以 DHA 的「指謂／命名」、「謂語」、「論證」、「觀點、框架或論述再現」及「強化或淡化」等五個策略的分析指標為指引：

- 一、指謂／命名策略：習近平講話中的不同個人或群體如何被命名與分群？
- 二、謂語策略：不同的個人或群體被賦予了哪些刻板印象、特徵及評價？選用的修辭預設、召喚了哪些暗示或隱喻？
- 三、論證策略：習近平的論辯主題與基模為何？透過何種論辯策略或技巧來排斥、壓迫或扭曲他者？用以合理化的論點有何謬誤？
- 四、觀點、框架或論述再現策略：習近平所持的觀點、標籤、價值觀與論據為何？他是立於什麼位置、循何角度加以表達？
- 五、強化或淡化策略：使用的動詞、語氣為何？趨於強烈或緩和？有沒有被淡化的缺席者？

此外，DHA 強調論述實踐與歷史語境、社會體制運作間的辯證關係，著重對互語性及行動場域的分析 (Wodak & Meyer, 2016)。故本研究在針對文本展開 CDA 之際，將閱兵論述置於習近平言說當下的政治脈絡中進行脈絡還原與再脈絡化。舉例來說，Wodak 曾在《海德爾現象》（*The Haider Phenomenon*）及《質化研究實踐》（*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等書中，示範了類似的實例分析。她研究奧地利自由黨領袖海德爾（J. Haider）的媒體受訪紀錄，第一步先確立出

文本中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形構，接著運用語言學分析，辨識出海德爾在論述上的種族偏見，以及隱晦的標籤化、誤現他者、孤立等語言特徵及策略，例如頻繁使用「我們」這個概念隱喻、連結黑人與毒品，以及把母語非德語的族群歸為他者等；為了進一步掌握海德爾論述在社會實踐中的目的與影響，Wodak 通過對歷史背景、政治形勢及社會文化的檢視，對放到特定語境來的語言學分析結果進行形式分析，從奧地利民族主義、反猶太主義、高失業率及排外氛圍等歷史脈絡的還原過程中，揭露出海德爾論述在社會實踐中的排外、製造對立及種族歧視等操作 (Wodak, 2004; Wodak & Pelinka, 2002)。

概括來說，本研究是以文本的修辭為起點，向語境分析延伸，並超越文本與論述的內在邊界，運用背景知識將習近平的閱兵論述嵌進一個更大的政治與國際關係情境中，亦即納入習近平言語之外所連結的國際情勢、政治社會及體制架構等變數，在分析過程中進行語言及非語言實踐的交叉檢證，透過論述實踐與社會實踐的辯證來驗證文本分析結果，嘗試還原中共閱兵論述的政治實踐意義。

肆、閱兵論述與政治實踐

習近平於閱兵典禮上的演說全文總共 883 字。就字數頻次與篇幅配置論，習近平用 126 個字向烈士及各界致意；用 298 個字讚頌中國轉弱為強；用 90 個字強調堅持共產黨領導；用 188 個字向港澳臺及國際社會揭示「和統兩制」、「和平發展」方針；最後用 173 個字進行召喚。整體而論，凸顯中國「強起來」的文字占逾全部講稿的 3 分之 1，充分意味這就是習近平最為關切的議題。另文稿中以 3 段均由「前進征程上」開頭的段落，申述黨的領導、港澳臺關係及國際戰略等相關範疇的發展方針，相繼提出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和平統一及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等 5 個堅持，其中又以「共產黨領導」為先，顯見其乃習近平至為堅持的理念。

一、論述形構與治理策略

(一) 黨的絕對領導

1. 黨對國家的絕對領導

綜覽整個講話文本，全文論述結構係以「70 年前的今天」、「70 年來的今天」及「前進征程上」為核心，以時間軸作為鋪陳的次序，並用「毛澤東宣告建國」、

「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及「5個堅持」分別占據過去、現在與未來等各個橫斷時空的行動主體位置，其中5個堅持則以「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先行。習近平透過論述鋪排，以中共接合了中國的發展歷程，刻意凸顯建黨與建國的關聯，將建國的意義聚焦於「共產黨建國」、「毛澤東宣告建國」的歷史空間，強調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黨的功績」即切斷了70年的國家發展，在建國的論述裡取得了鬼影子優先性，通過共產符號一體化來網綁愛國主義，讓愛黨與愛國形成強制性的關係與聯繫，向民眾召喚聽黨話、跟黨走的集體意識，以消弭「把愛國、愛黨對立起來」的反抗論述。

進言之，鏈接國家從「站起來」、「富起來」演進到「強起來」發展想像的中共，成為引領國家建成、建設、建強的決定性關鍵，因而在論述中取得了「先進性」的行動者位置，複製著黨代表先鋒隊、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的政治認同。藉由專政權力的仲介，統治與被統治階級因而區分開來。對比共產黨統治階級的先進性，作為被統治階級的「各族人民」、「中華兒女」自然被置於「落後性」位置，固化了黨唯一代表人民的壟斷地位及對國家絕對領導的資格，一方面鞏固共黨專政的合法性，偷渡「反黨就是反國家、反人民」的價值論述，另一方面則在建構我群與他者，透過暗示先進性來製造「落後」的負向標籤（negative labeling），將統治與被統治階級的優劣、主從關係對立及固定起來，防杜專政體制被迫鬆動或崩盤。

2. 以習核心代表黨的絕對領導

習近平講話中僅提到1個「我」，用以代稱自己向各界致賀。以象徵個人的「我」指謂自己作為黨中央、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中央軍委的代表，旨在宣告自身對黨政軍各體系的絕對控制，演繹「習核心」在黨的指導思想中之最高地位，以及其在黨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三位一體」制度下的絕對權威，確立自己作為單一領導核心的權力及全黨至高領袖的領導體制。

習近平閱兵講話與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相異之處在於「對歷任領導人頌揚的捨棄」。鄧、江、胡3人分別在建政35、50、60週年閱兵講話時，將各個前任領導人納入論述，習近平卻僅保留毛，中間歷任領導人則被缺席，透露出習近平冀在政治地位上超越鄧、江、胡而與毛齊名的意圖。對照其治理實踐，在閱兵結束24天後召開四中全會，會中仍未指定接班人選，且在公報中載明重申「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在京舉行〉），

2019 年 11 月 1 日)，印證走入第二任期的習近平仍在積極鞏固黨與自身權力，極可能利用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的修憲成果尋求連任，預料在第 20 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應該仍無交權打算。

（二）民族偉大復興

1. 愛國主義優先

習近平的閱兵論述瀰漫著濃厚的國族主義、民族主義，為召喚愛國主義累積集體行動與政治動員的能量。通篇講話中，總計使用 10 次「偉大」來修飾祖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復興或成就、中共及中國人民等，是全篇稿中頻數最高的狀語，不僅是對國家、民族語彙的修飾，更是對國家認同及民族自信的召喚。在謂語策略上，偉大的祖國反覆與「我們」相鏈結，而所動員者均是正面修辭，包括感到自豪、沒有任何力量能撼動、萬歲，以及努力奮鬥等，以定義我群延伸召喚的邊界，直接賦予民族及國家優越感的身分與價值認同，再將其轉化成政治資產，作為後續愛國主義政治演繹的基礎。

閱兵講話裡，完全沒有被直接建構的他者，均是透過我群的召喚而對立出來。論述中，中國被定義為社會主義的、屹立在世界東方的，並暗喻長期有股力量在撼動、阻擋中國進步。藉撼動、阻擋等謂語的張力來操作對立，建構出資本主義的、屹立在世界西方的他者，而這裡暗喻的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權，甚至就是直指美國。習近平的論述目的即在暗批美國策動貿易戰、香港「逆權」運動及顏色革命，雖未直接公開批評，但習近平以肯定句表達「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撓……」的斷言式論述，即在對美國釋放全篇講話中力道最強的警告，亦向內部民眾傳達對美國作為阻撓外力應有的警惕。

進一步說，習近平以撼動、阻擋等負面修辭來框架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行動，暗示其不友善的對中交往態度。另一方面，提到被收編用來指謂中國的祖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時，則是動員了屹立及前進等正面修辭，明示了中國砥礪前行的意志與決心。習近平在民族主義架構下，操作對立的謂詞修飾，以及暗示與明示的刻板印象牽連，製造出「團結抗美」的集體想像。將它置入中共建政 70 週年所處的戰略情勢中理解，在美國優先與中國夢相競而成的國族主義對抗系統中，習近平輸入了反美情緒與抗美想像，進而產出愛國主義優先的意識形態，為警告美國提供有的放矢的支撐，亦為民眾應當如何警惕美國揭示了集體行動的價值認同及方向指引。用英國大文豪 Samuel Johnson 的話說，愛國主義成了中共的最後

避難所（the last refuge），是製造共同敵人、渲染共同敵意的催化劑，也是強化敵我區別、團結抗敵共識的精神嗎啡。

2. 各族團結奮鬥

在命名／指謂策略上，習近平操作了「我們」這個代名詞，將各民族、海內外共享中華文化的各群體納入以共產黨為中樞的「中國」我群中。作為我們的各族、各群體則被形容為無比喜悅、為祖國自豪，將共黨個體特質等同各族、各群體的整體特質，剝奪了不同民族表達對「十一國慶」歧異立場的能動性。

無比喜悅、為祖國自豪等調語讓中共「我群」的集體認同自象徵性邊界產生出實踐中的邊界，再通過從國家級慶典上傳散的權力轉換，將這些調語所象徵的鉅觀概念——團結，塑造成能夠規範或作為群體行動指引的社會邊界，並在這條認同邊界上，為黨國意識形態區分出我群與他者。

中共在中國族屬（ethnicity）認同流動性與非斷裂性的強勢擴張，對各族的歷史及政治、文化、宗教等權利造成普遍性的壓迫或箝制，無比喜悅、為祖國自豪等調語恰好成為對各族人民被迫作為中共我群的反諷。包括新疆再教育營對維吾爾、哈薩克、吉爾吉斯族的大規模拘押、駐村工作隊與網格化管理（grid management）對藏人日常生活的全面滲透，以及港警處理反送中、三大罷³的過度執法（湯惠芸，2019年8月5日；劉致昕，2019年7月25日；Hornby, 2016, April 3），自證了習近平的團結召喚，更接近是一場強制改變國族認同的同化運動。隱藏在召喚背後的社會政治與歷史情境，正是中共通過對思想、信仰體系的清洗來實現意識形態控制的現實。

習近平還頌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莊嚴、偉大的歷史，以建國的框架，篩除竊政的事實，刻意淡化中共前身係受蘇共資助建立的俄屬蘇維埃政權，無法代表新中國的史實，以及入侵西藏與3次鎮壓拉薩的歷史責任，藉以削弱中華民國、西藏從不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港民在國慶當日發起「十一國殤」集會的競爭論述。這些淡化則是習近平召喚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根本支撐。

（三）鬥爭重建秩序

習近平運用了5次「堅持」、2個「團結」、4次「前進」，以強烈的意志性動詞，展現在「征程」上實踐共產黨永續執政、一國兩制解決兩岸問題、開放

3 罷工、罷市、罷課運動的合稱。

市場換價國際影響力的決心。「征程」是充滿戰鬥與克服險阻意涵的語彙，習近平以「堅持」貫穿論述，預示了可能趨劣的內外部形勢，亦指明了後續解決治理困境、兩岸矛盾及美國壓迫等問題的核心原則與方向。在中共的征程中，共產黨是主體，人民是客體，臺灣是兩岸關係中被消失的客體，改革開放則是進入沒有改革的開放新常態。相同之處就是權力的壟斷：人民沒有議政的權力，臺灣沒有論述的權力，美國沒有就民主、自由、人權及結構性改革和中共協商的權力。以權力壟斷為本質的「堅持」政策，維持其運行的政治動能即是鬥爭，鬥爭雖不曾閱兵講話中被說出（unsaid），但卻始終隱晦地附著在論述的實踐行動裡。

1. 以鬥爭支持港臺工作

習近平提出「團結」的價值框架來遏制兩岸三地對一國兩制的討論與分歧，修辭策略是將「團結」與「和平」兩組價值互為因果。但中共在現實的「和統兩制」政策裡堅持保留「收回兩制放權」及「武力犯臺」選項，致使兩岸三地無法取得共識或交集，互為框架的團結、和平訴求即在實踐過程中與港臺的「民主」價值框架形成競爭。可以說，習近平的閱兵論述是在以團結價值向民主價值鬥爭，延伸民族主義及民主制度於兩岸三地間的競逐關係，進而獲取「和平」話語權的意識形態布局。

在團結與民主的框架競爭中，習近平透過「排除」來表現權力效果，講話中完全不提及臺灣，讓臺灣從對話彼端被消失，兩岸關係的再現論述也從兩岸一家親轉向一國兩制，進而削弱臺灣主體性。通過對論述裡的權力（power in discourse）做出不對等的結構安排，並藉鬥爭及作為其主要表現形式的武統暗示來獲取壟斷性的論述權力（power over discourse），讓習近平能在兩岸論述的競爭中主導話語權（power of discourse）⁴，把統一的論述內涵從兩岸對等共構導向中共片面決定，將對臺決策自以往的策略行動選擇提升到直接改變賽局結構。

然而，港臺皆認為和平應植基於民主，而非以武力相脅的團結。尤在兩岸方面，中共將武統作為和統的同構，用以支撐「拒團結則遠和平」的威懾隱喻。例如裝設逾千枚導彈瞄準臺灣、在東部戰區火箭軍第 61 基地部署 7 個導彈旅⁵，以及證諸此次閱兵的裝備展示，射程 280 公里的 PHL-16 自行火箭砲取代了舊有

4 此處分析係循 Holzsheiter (2005) 針對語言權力提出的三個面向，從語言內在、語境及社會實踐等對應層面，考察習近平如何通過國慶閱兵論述進行權力鬥爭；有關語言權力概念的討論可參見 Wodak (2012)。

5 配備東風-21C、東風-16、長劍-10 等短、中程戰術彈道飛彈，主要針對臺灣與美軍沖繩基地。

的 PHL-03⁶，對臺火力涵蓋從新竹沿海向內陸延展 150 公里 (Fisher, 2019, October 1)。這些都是習近平以鬥爭開展對臺工作的實質內涵。面對中共仗恃武統的團結召喚，臺灣則以控訴「無誠信」及「非民主」進行對抗。

關於港澳治理及兩岸發展方針，習近平則以未來進行式而非未來完成式展開論述：「前進征程上，我們要……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推動海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完全統一……」，透露出中共雖高度重視港臺工作，但卻沒有絕對性的急迫感。因中共認知，港臺問題實際就是美國問題，對美鬥爭才有急迫性。因此，港臺鬥爭工作現階段應會呈現「戰略擱置，戰術頻擾」的趨勢，目前並不會設定具體時間表。

證諸四中全會即可發現，中共提出「建立以國家安全為由的自治區法律制度與執行機制」作為對港鬥爭工作的主軸，會後再由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釋出對港 16 條措施，訴諸既聯合又鬥爭的兩手策略。可以預見，聯左、拉中既已先行，後續的干擾戰術就會出現打右鬥爭，並以司法體系改革為主要目標，包括依憲治港、清洗外籍法官、加大政法系統干預力道及加速《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進程等，均是中共對港開展團結鬥爭的高度可能選項。

2. 以鬥爭支持美中對抗

閱兵講話中，美國被以否定修辭的方式，作為被隱喻的「撼動」、「阻擋」力量，未被放在阻撓行動的主體位置，削減了美國「妨礙」中共發展的責任。顯然，習近平選擇了低強度的抨美策略，代表中共面對貿易戰攻勢，現階段仍以鬥而不破為原則。從辯證的角度觀之，演講裡透露出的中美對抗，基本涵蓋了「空間鬥爭」與「行動鬥爭」兩種意涵。

空間鬥爭係論述裡所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我們偉大祖國的地位」。所謂的祖國地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地緣政治裡應被集體認知為「無以撼動」的共識，也就是中國作為亞洲崛起霸權的事實。惟中、美將彼此視作競爭對手是無庸置疑的，習近平在論述裡暗地鑲嵌空間鬥爭，即在針對所處的地緣政治困境，對美釋放警告訊號，對國際推銷「全球化」選項，對內則召喚共體時艱、警惕阻撓外力的民族主義與鬥爭路線，為營造「類戰時經濟」模式預做鋪墊。

進一步說，論述中影射的對手就是美國，將美國對中共的競爭行為以「撼動

6 PHL-03 最大射程 150 公里，可從福建平潭覆蓋臺灣新竹地區；2017 年曾在中共建軍 90 週年閱兵中出現。

「祖國地位」標籤化，讓民族情緒能在對抗中起到關鍵作用。習近平還試圖通過全球化論述來聯合國際力量，亦即論述中提及的「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向國際社會暗示，在美國選擇走向孤立主義之際⁷，中共將擔當大國責任，填補美國引發的秩序真空，並持續以市場開放交換世界各國「互利共贏」。目的即在操作全球化論述同美國孤立主義鬥爭，具體實踐包括利用國際安全建制增添威望、布局「一帶一路」獲取國際秩序影響力等，通過內外戰線的統一來推進反美鬥爭，並藉此將經濟收益轉換成地緣政治利益。

行動鬥爭係論述裡所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前進步伐是指中共的國家發展進程，習近平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訂下的目標是實現兩個一百年⁸。具體行動包括籌建並主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布局帶路戰略、建設航太與網路強國、推進中國製造 2025、發展軍工產業，以及爭奪人工智慧、機器人等科技領先地位。中共支持這些目標的行動，經常涉及由國家主導的匯率操縱、不當補貼、技術強取、強迫轉讓，以及系統性收購、商業竊密、智慧財產權盜取等不公平的行為與政策。美國就此發動反制，而習近平則以「阻擋的力量」將美國反制行動標籤化。藉論述操作鬥爭的手法和「空間鬥爭」如出一轍，不同之處在於空間鬥爭係與美展開地緣政治競逐，而行動鬥爭則是在貿易談判、金融科技、技術創新、知識產權、軍事戰略外溢等範疇，挾民族主義和美國進行攻防與較量。

四中全會召開前，習近平提出以區塊鏈核心技術作為國家金融發展目標，用意就在乘既有優勢對美發動金融鬥爭，以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主權數位貨幣（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 DCEP）構建一個取代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SWIFT）及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CHIPS）等美元清算結算系統的新交易網絡（聶建中，2020）⁹，削弱美元國際流通能力，讓人民幣、石油與美元脫鉤。由區塊鏈技術驅動的金融戰，實踐了習近平演講裡釋放的行動鬥爭訊號，展露出中共通過去紙幣化、去美元化，試圖重構後美元時代全球金融新秩序的戰略意圖。

7 例如自阿富汗與敘利亞北部撤軍，以及一系列從國際組織退群的行動等。

8 係指在中共成立 100 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0 年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9 SWIFT 及 CHIPS 經常是美國用來對外實施金融封鎖與制裁的機構。

二、論證謬誤與實踐意圖

從實踐推論的角度看，習近平致力突破內外困境，並以此作為實踐意圖，而在閱兵的儀式情境下，將透過公開講話來達到目的。但其論述實踐必須面臨歷史、政績與西方普世價值的挑戰，操作論證謬誤就成了習近平誤導民眾理解真實的選項，而鞏固政權穩定的信念，則會促其決定採取行動。

在 Wodak 的分析實例中，也可經常見到運用謬誤論述來達到政治目的的例子。例如，Reisigl & Wodak (2009) 針對捷克卸任總統 V. Klaus 在美國眾議院的發言紀錄進行分析，發現 Klaus 運用八項訴諸斷言的論證策略來操作不確定性謬誤（the fallacy of uncertainty）與自然謬誤（the fallacy of nature），誘導民眾認知錯誤的氣候知識，以促使碳排放管制政策獲得鬆綁。基此，本研究將從論述謬誤及其辯證策略的診斷著手，嘗試揭露習近平政治實踐的意圖。

（一）「Y，因為 X」的論證架構¹⁰

透過「Y，因為 X」的命題假定為論述提供理解架構，並操作論證策略來扭曲或置換因果關係，將其論述合理化，以達政治認同與收編之目的。

1. 共產黨的政治自我呈現

以「毛澤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論證，為「中華民族擺脫悲慘，走上實現偉大復興壯闊道路」的聲稱提供論證前提；其中存在虛假關係（spurious relationship），兩者並無因果。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不再貧弱、不再受欺凌，開始富強的基點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毛澤東則是以「三面紅旗」策動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後續更釀造文化大革命，讓國勢走向衰退。習近平的論述功能係在哄抬毛歷史定位、象徵繼承毛政治遺產、強調共黨專政合法性，以及表明政治結構決不妥協。宣示中共堅持以黨領政、以黨領軍，決不改旗易幟，藉此回應美國提出的「結構性改革」要求，同時復辟毛澤東鬥爭理論，用以化約黨內權鬥及中美衝突，為後續劃分敵我、動員群眾及統一戰線預做鋪墊。

2. 意識形態的鬥爭隱喻

以「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的論證，為「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

¹⁰ 此部分的分析係從論證前提的架構切入，運用邏輯推理技巧來辯證習近平閱兵講話的謬論，有關後續述及的虛假關係、後此謬誤等非形式謬誤概念的討論，可參見 Bennett (2012)。

動……祖國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前進步伐」的聲稱提供論證前提；宣稱是中共實踐了社會主義路線，才讓國家的地位與富強之路不被阻撓。其中存在後此謬誤（post hoc fallacy），中共崛起不必然是拜「社會主義」之賜，應是奠基於 1978 年的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本身就是鄧小平將社會主義向西方資本主義修正的過程，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教條主義，把國家發展重心轉移到經濟現代化，並以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取代計畫經濟路線（姜新立，2018）。此論證功能在藉社會主義的鏈結，偽稱共產黨領導對中國取得今日成就與躋身強國之列的貢獻，頌揚社會主義對中國政治的實用邏輯，鞏固「黨的絕對領導」之合法性與權威感，並進一步喚起民族自信，釋放「對抗阻撓力量」的訊號，預為美、中鬥爭構築心理防線。

（二）「訴諸斷言」的論證形式¹¹

召喚民眾對中共領導，以及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堅持，卻未提供其他理據。

1. 共黨居主的神話動員

論證訴求為「中國的昨天已經寫在人類的史冊上，中國的今天正在億萬人民手中創造，中國的明天必將更加美好」；屬真理斷言（claim of truth），宣稱歷史古今的實踐，決定了中國夢的未來成就。語態上，「億萬人民」和「中國」主客易位，變成創造今日中國的客體，雖然未被省略，沒有減損「創造」的配價（valency）能力，但選擇應作為受詞的「中國」為語用主體，隱晦地削弱了人民對國家建設的貢獻與主導性。

由中國代替億萬人民成為建設國家的主要行動者，將使中國這個指謂 70 年前由毛澤東宣告成立、堅持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載更多角色功能。億萬人民變成從屬，習近平真正召喚的我群是以自身為核心的中共統治集團與政黨。習近平還以祈使句動員「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緊密地團結起來」，黨、軍與人民的依附關係從次序配置即可窺見，亦透露出習近平為「中國明天」擘劃的中國夢，無疑只能是以共產黨的絕對領導為前提。

若以國家為主體，此論證即屬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11 有關真理斷言、規範權利斷言等訴諸斷言的論證技巧，可參考 Reisingl & Wodak (2009) 關於捷克卸任總統 Klaus 在美國眾議院就氣候暖化與變遷議題進行答詢的論證策略分析；另邏輯推理部分，後續述及的歸因謬誤、不當預設謬誤等概念的討論，可參見 Bennett (2012)。

將中國的「美好明天」以自利偏誤歸因為「接受共產黨領導」所致，卻將建政前的「悲慘命運」暗喻是西方列強的欺凌所為。事實上，近代中國的悲劇除肇自西方強權外，喬裝成中國領航者的中共亦有責任。1931年中共於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70年前中國遭受日本侵略、蘇聯蠶食和國共內戰的歷史間，陸續作為假抗日、武裝保衛蘇聯及分裂中國的俄屬蘇維埃政治實體（辛灝年，2015）；70年後卻藉歸因謬誤爭奪話語權，混淆及重新定義歷史發展，巧妙置換歷史定位，任意掩蓋了錯誤與責任。

2. 對預設港臺團結的合理化

論證訴求為「我們要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推動海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團結全體中華兒女，繼續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奮鬥」；屬規範權利斷言（claim of normative rightness），訴求須堅持和統及兩制，港澳才能繁榮，對臺才有和平。此論述動員了不當預設的謬誤（fallacy of inappropriate presumption），將和統及兩制作為港澳臺治理「良制」的訴求合理化。事實上，習近平同樣沒有為此訴求提出證據，且將不應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視作必然，進而產生當如是說的不恰當論證。

尤其中共的和統公開夾雜武統選項，而一國兩制已在香港被證實是失敗的實驗，反送中運動更是對中共一國兩制承諾跳票的深刻揭露，讓兩制政策急遽流失民意市場。在兩岸事務方面，繞過政府的談判、缺乏民意基礎的協商，以及華而不實的兩制承諾等，已使臺灣官方將和統及兩制定調為「和統是宣傳，武統才是目的」、「一國兩制沒有臺灣方案」與「一國兩制就是消滅中華民國主權」。習近平對和統及兩制的不當預設，目的在將中共當局與港臺間的價值矛盾去脈絡化，隱去彼此的衝突及不和諧，並藉託中華兒女之名，召喚港臺民眾團結在統一及中國夢的後設敘事下。

伍、習近平「新時代」的意識形態再建構

一、去價值化策略

習近平宣稱代表我群的全國各族人民是「團結」的，藉由修飾策略對我群特徵進行評價，同時也將「他者」定義出來並予標籤化。亦即各族人民均應團結在中共所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並服膺其民族復興及一國兩制政策方針。那些違背團結規範的就是他者，三無農民、退役軍人、宗教及邊疆民族反對勢力、

維權律師、異議人士，以及司法冤獄、遭當局強制拆屋的上訪民眾等，均因反抗專政體制與威權政策，成為出現「不團結」偏差行為的他者，一旦透過對比蘊涵（implicature by contrast）將這些爭取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族群以偏差歸類，即可宣告對其指摘、譴責或糾錯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習近平以「我」而非具有全體人民表徵的「我們」，代表黨中央及國家權力機構向各界致意，人民從國慶的主體變成客體，顯露出中共的黨治特徵與假託民本思維的人治本質，自我揭露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論述矛盾。此外，演說所強化的「5 個堅持」係以共黨基本理論、路線、方略，以及和平統一、和平崛起為主要內涵，除和平外，自由、民主與人權等普世價值完全「被消失」。中共意識形態的去價值化就是刻意提倡團結、和平的價值訴求，排拒能與西方國家開啟溝通、尋求共識，但卻與其專政體制相矛盾的價值意識，藉以防堵西方布局「顏色革命」。

由此觀之，習近平獨以團結、和平進行喊話，之於臺灣是在勸誘促統，之於美國則在暗示鬥爭底線。而致力摒除自由、民主與人權價值，並挪取中國儒家思想強調權威、秩序、集體大過個人的傳統意識，以及士大夫菁英入世的政治文化，目的即在召喚「民本為體，民族為用」的政治認同。習近平刻意在西方普世價值的對立面，豎起以王道、富強、善群等中華文化進行包裝的東方價值，就是企圖以民族主義支撐民本政治思想，用「民本」對抗「民主」¹²，合理化習近平以黨治國、我將無我的意識形態，從體、用兩面阻斷民主思潮向中共人治、黨治的合法與權威性根基發出挑戰。

二、去協商化策略

面對全球經濟與貿易，習近平強調中國將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惟自 1978 年以降，「改革」與「開放」一直以並列式複合詞（compound word）的形態被使用，但此次閱兵講話卻刪除了「改革」，「改革開放」變成以「開放」的語彙單獨存在，呼應了 2018 年習近平自己在「慶祝改革開放 40 週年大會」的宣示：該改的、能改的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 4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2018 年 12 月 19 日）。改革的消失，傳達出中共國際交往方針將有轉折的訊號，同時也在低調回擊美國把民主、人權納入貿易談判的舉動。美國要求中共在經濟、政治、宗教及人權等更多領域實施自由主義，

12 民本政治的主體為統治者，民主政治的主體則是人民。

習近平則默以「只談開放，不談改革」回應，對任何侵害共黨政權延續的威脅，尤其是民主、自由、人權等中共集權治理的軟肋，均直接略去以協商作為決策選項的可能。

換言之，中共雖倡議互利共贏的全球化或雙、多邊貿易合作，但不會在政治、經濟及軍事等方面為此做出相應變革，順應開放的改革之舉宣告走入歷史。習近平「新時代」的全球經濟參與就僅止於市場開放，且是以中共有參與制定的規則或秩序為前提，亦即一種賣方市場（seller's market）的態度。尤其 2019 年 5 月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赴美貿易磋商失敗，加上中共判定香港反送中運動有美國在背後支持，導致中共認定貿易戰已由經貿、外交問題延伸到政治主權問題。這使北京當局強烈警惕到美國可能以開放倒逼改革，故而斷然否決「改革」協商，避免美國敲打與中共派系鬥爭相互利用，防杜貿易戰失利及香港反送中運動遭江澤民上海幫的「倒習」勢力操作升級，以維繫習近平個人集權，並穩固共黨的政治、社會與經濟支配地位。

三、去延續性策略

中共自 1978 年改以混合經濟模式取代計畫經濟後，「改革」與「開放」始終合併稱之。四十餘年後，習近平不提「改革開放」，而獨以「開放」代之。顯然習近平正試圖弱化改革開放及其總工程師鄧小平對經濟發展的歷史作用，藉由淡化「改革過程」，讓「開放成果」穿越時空與毛澤東及其階級鬥爭路線勾串起來，從而建立屬於自己的「新時代」，與改革開放時期做出區隔。

具體而論，中共不論施行文革、改革開放、左傾、右傾、階級鬥爭或經濟建設，都是在「政黨居主」（the primacy of party）結構下，以主義、思想、理論共構而成的意識形態為指導（李亞明，2006）。中共意識形態體系基本上是由各代領導人與政黨間相互利用、促動、制約或妥協建構而成。逐漸鬆動的專政基礎，須仰賴領導人設法維護及解套，領導人的政策主張則須委身意識形態結構之中，才能被認定是黨的集體智慧結晶，並因而獲得職務以外的實際權力。然而，隨著領導政權多屆遞嬗，意識形態結構需要吸納更多卸任黨魁的政策主張，導致結構持續膨脹，最終無以容納（李英明，2017）。

進言之，中共意識形態的論述範疇有限，習近平必須讓鄧小平理論及依附其下的三個代表與科學發展觀退出意識形態結構。故習近平將開放的條件從「改革」置換成「鬥爭」，把長年僭越人民作為改革主體的「鄧」以「毛」代換之，

促進改革開放的歷史斷裂，製造民眾認知真空，進而確立改革開放的非延續性，將鄧小平理論推入歷史，宣告意識形態結構從改革開放轉向新時代。習近平思想即能越過鄧小平、江澤民及胡錦濤，直接上連毛澤東，形成意識形態串接，以便於自我宣稱「習思想」承繼於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係有別於改革開放時期的新時代意識形態代表。除褪去鄧小平理論對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導功能，亦讓習近平得藉意識形態承繼的斷裂，擺脫老人政治束縛，創造出更加充分的決策裕度，為後續採取左傾策略應對貿易戰及香港民運，預做準備。

四、再主權化策略

習近平於國慶前日的晚宴上，同時提到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隔日閱兵講話卻略掉九二共識，將兩岸關係與一國兩制對接，就「習五條」宣稱要「探索」兩制臺灣方案¹³的行動釋出階段性答案。顯然習近平在兩岸關係的主控上，較 2019 年初更加自信，給出的態度則是：求同原則不變，但對存異的容忍度將驟降。習近平還以「繼續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奮鬥」替兩岸關係的發展做出片面總結。

中共在淡化九二共識、只談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向「我們」這個集體表徵進行召喚，我們係指涉堅持共產黨領導、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於「中國」的各族人民與海內外中華兒女。習近平沒有召喚臺灣民眾，讓臺灣民眾喪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動性，奪去臺灣參與兩岸關係規則制定的權利及論述能力。此外，相對於「我們」的召喚，臺灣民眾被塑造成他者，對習近平維繫國族認同，以及激發境內民族主義「出征」臺灣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

總的來說，閱兵講話中關於兩岸的論述，就是轉向封閉主權爭議的模糊空間，將命題的預設層次回歸「主權化」格局，把兩岸事務的討論明確置於該架構下。這將剝奪臺灣在主權上「各自表述」的權利，直接確立「和平統一」的總基調就是「一國兩制」。兩岸的統一論述便從「主權爭議」降格為「制度協商」，由務虛轉向務實，自一貫的「雙方協商後擱置」改變成「片面預設後擱置」，呈現一種沒有急迫性卻又收緊論述彈性的操作。

13 「習五條」為 2019 年 1 月習近平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 40 週年」紀念會上提出的對臺工作綱領，其中最受關切者為「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王堯、馮學知，2019 年 12 月 19 日；習近平，2019 年 10 月 1 日)。

陸、結語

本研究處理了中共建政 70 週年閱兵的官方論述，聚焦在閱兵典禮上的習近平演說。研究發現，習近平形構了黨的絕對領導、民族偉大復興、鬥爭重建秩序等 3 組論述。而透過 Wodak 提示的分析架構，本研究發掘出講稿中採取的幾項論述策略：

首先，在自我指涉上，習近平以「我」指稱自己作為黨政軍最高機構代表的身分，重複演示了「三位一體」的至高領導權威與絕對的政治控制力。習近平另以「我們」指謂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各族人民、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塑造而成的「中國」想像與認同，並嫁接了共黨專政的國統與法統正當性，讓愛國與愛黨劃上等式，剝奪不同民族對「中國」族屬認同的歧異與反抗動能。

第二，在調語策略上，習近平多次鏈結「偉大的祖國」與「我們」，並動員感到自豪、努力奮鬥等正面修辭，在我群中醞釀民族優越感及團結意識，作為激發愛國主義的燧石；而閱兵論述的他者，係透過我群的召喚被對立出來，最明顯者即是被隱喻為妨礙力量的美國。習近平以撼動、阻擋等負面修辭來指涉美國對中政策，喚起民眾對近代屈辱歷史及美帝殖民主義的集體記憶，操作「團結抗美」共識，藉以驅策群眾並對美形成警惕。

第三，在價值框架上，習近平以「建國」框架隱去「竊政」的事實，並透過暗示共產黨的先進性來製造他者的落後標籤，確立統治與被統治階級的優劣、主從關係，同時借力愛國主義，召喚民眾「聽黨話、跟黨走」的政治認同。習近平還召喚了「民本為體，民族為用」的政治觀，從體、用兩面對抗西方民主思潮；在港臺布局上，習近平提出「團結」與「和平」的價值框架，將兩者互為因果，並於「和平」裡包藏武力解決選項，藉和平來裹脅團結，以「民族團結」向「民主制度」鬥爭。在兩端框架的競爭中，習近平透過「排除」讓臺灣從論述裡「被消失」，削弱臺灣在兩岸關係中的論述與實踐能力。

第四，在與美國的價值鬥爭中，習近平以全球化論述來對抗美國的去全球化政策，藉由連結國際「反美孤立主義」，將全球化戰線從經濟談判轉向政治捍衛。值得注意的，習近平將美國隱喻是阻撓中國的力量，卻未將其置於主要位置，減弱美國阻撓行動的責任，顯然中共雖對貿易戰不願示弱，但對節外生枝亦不樂見。

第五，在強化策略上，「堅持」被頻繁用來動員民眾支持共黨專政與中共當局的政策，映射出習近平捍衛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道路及一國兩制方針的決

心。習近平還將「5 個堅持」塑造成為對抗西方勢力及促進民族偉大復興的唯一解決方案，惟在「堅持」論述中，除「和平」外，自由、民主與人權等普世價值卻完全匿跡。在香港反送中運動不斷升級之際，中共做此論述特別值得警惕。

第六，在論證策略上，習近平確實操作了許多論證謬誤來達到政治目的，包括以虛假關係、後此謬誤來扭曲史實，藉以鞏固共黨專政和社會主義路線；亦訴諸真理斷言及規範權利斷言，各自動員歸因謬誤、不當預設謬誤，試圖湮滅歷史錯誤與政治責任；習近平還將北京當局與港臺間的矛盾去脈絡化，把論述的表象（representation）指向和諧社會，藉祖國統一的召喚，將港臺民眾團結在中國夢的集體想像下。

在意識形態建構部分，習近平採取了去價值化、去協商化、去延續性及再主權化等策略。總的來說，習近平終結鄧小平以降的改革開放時期，揭示後改革開放「新時代」，假託民本政治思想，以延續共黨專政結構、抑制反對派系，以及鞏固「習核心」個人集權；對香港及兩岸問題則趨向「戰略擱置，戰術頻擾」，在涉及主權議題上，透過行政、法制、宣傳等措施強硬表態，對港從自治轉向高壓，對臺則棄「一中各表」而就「一個中國」，但在港臺問題的徹底解決上，卻無具體時間表。因中共當局認知，解決港臺問題必先解決美中問題。

與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及意識形態衝突上，中共操作反美情緒，召喚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動員國族主義與民族精神，抗衡「美國優先」引發的多元衝擊，並藉以支持兩國在空間、行動上展開的長期鬥爭。換言之，習近平的閱兵論述普遍展露一種「鬥爭」格局，而作為亞洲區域強權，此般政治路線與政策方針，恐有導致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雙輸結果或使各方陷入利空之虞¹⁴。

本研究在主題、理論觀點與方法上，結合了儀式、傳播及 CDA，以中共閱兵論述的儀式傳播為主題，有助拓展傳播文化研究的領域；此外，CDA 應用於儀式傳播研究的嘗試，一方面延伸了論述研究的範疇與知識，另一方面隱喻作為研究儀式傳播與傳播儀式觀的聯繫窗口，藉由 CDA 對其進行解讀的研究路徑與方法，明確了儀式傳播分析從傳播儀式觀出發，朝文化轉向的可能。

本研究基於傳播儀式觀，認知中共閱兵論述為一儀式性傳播，既是儀式，也

14 納許均衡是指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參與者的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中，參與者在知悉彼此均衡策略下，只要有人不改變策略，個別參與者就無法改善自己的狀況（Osborne & Rubinstein, 1994）。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就是典型案例。在賽局中，當任何一方通過不合作而獲得優勢時，所有參與者隨時都會面臨囚徒困境，該模型證明了參賽者堅持以自我利益作為出發點時，雙贏或雙輸結局的概率相當（巫和懋、夏珍，2002）。

是傳播。中共通過儀式隱喻，將民眾聚集起來，使其在符號互動中，共享復刻的歷史文化、召喚而來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以及我群與他者共構的團結抗美想像，並就儀式秩序自我構建、相互約束，藉此連結社會，最終完成對共黨專政合法性、權威性的確認，並將自我納進中國夢的集體想像中。

然而，中共閱兵儀式的隱喻，必須從承載社會控制與意義體系的閱兵演講中探尋。故本研究從文本中窺看論述內在結構的不一致，從而揭露隱藏於論述實踐中明示、暗示的操縱或說服特徵，有利於洞察習近平的政治意圖及中共在其領導下的政策趨勢。惟本研究的局限在於，這場閱兵活動實際上吸引了兩岸三地及國際社會高度關注，許多媒體及網路社群也都提出體現各自主張的論述，但因研究目的之故，並未處理更多與意識形態競爭相關的部分；此外，習近平通過閱兵論述進行的政策宣傳，其具體效益為何，亦是本研究未能關照的範疇。

參考書目

-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在京舉行〉（2019年11月1日）。《解放軍報》，第1版。
- 〈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閱兵儀式和群眾游行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並檢閱受閱部隊〉（2019年10月2日）。《人民日報》，第1版。
- 〈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2018年12月19日）。《人民日報》，第2版。
- 王孝勇（2012）。〈Mikhail Bakhtin 的對話主義及其對批判論述分析的再延伸：以白玫瑰運動為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0：149-202。https://doi.org/10.6523/168451532012030040004
- 王海洲（2008）。《合法性的爭奪：政治記憶的多重刻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_____（2009）。〈作為媒介景觀的政治儀式：國慶閱兵（1949-2009）的政治傳播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16（4）：53-60。
- _____（2010）。〈政治儀式中的權力宣展與合法性建構——中國社會變革與政治發展中的國慶大閱兵（1949-2009）〉，《學海》，4：140-149。https://doi.org/10.16091/j.cnki.cn32-1308/c.2010.04.016
- 王堯、馮學知（2019年12月19日）。〈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訪中共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主任劉結一〉，《人民日報》，第2版。
- 王雅玄（2005）。〈社會領域教科書的批判論述分析：方法論的重建〉，《教育

研究集刊》，51（2）：67-97。

王皓昱（1997）。〈歐洲舊「法西斯主義」：政治福音與集體癡狂〉，《東吳政治學報》，7：105-131。

王智盛（2019）。〈《深度觀察》中共建政 70 週年與「十一大閱兵」〉，《交流雜誌》，167：21-24。

李永峰（2019 年 11 月 10 日）。〈人民幣 3.0 抗美元霸權，中國推動區塊鏈領先全球〉，《亞洲週刊》，33（44）：26-30。

李亞明（2006）。〈中共「政黨居主」的政治體制改革策略〉，《復興崗學報》，87：121-146。https://doi.org/10.29857/FHKAJ.200609.0005

李宗憲（2019 年 6 月 7 日）。〈臺灣新角色：貿易戰、軍售和印太戰略中的「臺灣牌」〉，《BBC 中文網》。上網日期：2020 年 9 月 16 日，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8555739>

李英明（2017）。〈習近平思想：新的中共意識形態模式的興起〉，《展望與探索》，15（9）：8-13。

李美賢、闕河嘉（2018）。〈臺灣「東南亞新二代」的形象建構〉，《傳播文化與政治》，7：133-174。

李華君、竇聰穎、滕姍姍（2016）。〈抗戰勝利 70 週年閱兵儀式的象征符號、闕限和國家認同建構〉，《新聞大學》，136：93-99，114。

李銀祥（2015 年 9 月 4 日）。〈戰略視界下的勝利日大閱兵〉，《中國國防報》，第 4 版。

吳明杰（2019 年 9 月 30 日）。〈【政軍杰論】內外交迫封城閱兵的習武帝〉，《放言》。上網日期：2019 年 9 月 30 日，取自 <https://www.fountmedia.io/article/35732>

吳明澤（2016）。〈一帶一路、亞投行與人民幣國際化〉，《經濟前瞻》，163：79-84。

巫和懋、夏珍（2002）。《賽局高手：全方位策略與應用》。臺北：時報文化。

辛灝年（2015）。《中國命運與臺灣前途：辛灝年講演錄》。臺北：博大。

林東泰（2019）。《批判話語分析總論：理論架構、研究設計與實例解析》。臺北：巨流。

林柏州（2009）。〈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國慶閱兵的政治意義——民國三十八年到五十三年（1949-1964）〉，《史學彙刊》，23：193-224。

林竣達（2017）。〈川普會逆轉全球化嗎？〉，《新社會政策》，49：45-58。

- 孟祥夫（2019年8月30日）。〈系列活動共慶新中國七十華誕〉，《人民日報》，第2版。
- 周暘展（2018）。《川普上任後的美、中關係發展趨勢及其對臺影響》。國立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https://doi.org/10.6814/THE.NCCU.NSMCS.001.2018.F11>
- 紀乃淳（2013）。《小說賽德克·巴萊中族群意識形態之批判論述分析》。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https://doi.org/10.6344/NTUE.2013.00354>
- 姚竹音（2016）。〈揭開習以為常的認同與差異：「部落的呼喚」得獎作品之後殖民批判論述分析〉，《人文社會科學研究》，10（1）：60-85。[https://doi.org/10.6618/HSSRP.2016.10\(1\)3](https://doi.org/10.6618/HSSRP.2016.10(1)3)
- 姜新立（2018）。〈中國大陸「改革開放」40年評析〉，《展望與探索》，16（11）：1-8。
- 倪炎元（1999）。〈批判論述分析與媒介研究之初探——兼論其在華文媒介上的應用〉，《傳播管理學刊》，1（1）：205-233。
- _____（2012）。〈批判論述分析的定位爭議及其應用問題：以 Norman Fairclough 分析途徑為例的探討〉，《新聞學研究》，110：1-42。[https://doi.org/10.30386/MCR.201201_\(110\).0001](https://doi.org/10.30386/MCR.201201_(110).0001)
- _____（2017）。〈2014年臺灣太陽花學運中的官方論述策略〉，《傳播與社會學刊》，42：23-57。
- _____（2018）。《論述研究與傳播議題分析》。臺北：五南。
- 原倩（2018）。〈薩繆爾森之憂、金德爾伯格陷阱與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經濟學動態》，10：50-59。
- 習近平（2019年10月1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招待會上的講話〉，《人民政協報》，第2版。
- 許農合（1999）。《1949-1999 國慶大閱兵》。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 黃之棟、朱容萱（2019）。〈你還是不懂我的明白——「大尾鱸鰻2」原住民族歧視風波的批判論述分析〉，《臺灣民主季刊》，16（1）：89-126。
- 黃健群（2018）。〈「一帶一路」與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策略與挑戰〉，《展望與探索月刊》，16（5）：94-110。
- 曾復生（2018年10月25日）。〈川普槓中引爆印太軍備競賽〉，《中時電子報》。上網日期：2019年11月11日，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181025004163-262104?chdtv>

- 湯惠芸 (2019 年 8 月 5 日)。〈香港反送中運動首次發起全面三罷 多區暴發 警民衝突〉，《美國之音》。上網日期：2020 年 7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hk-anti-extradition-to-china-gernal-strickes-live-q-and-a-/5029210.html>
- 楊增嶸、杜成敏 (2018)。〈「金德爾伯格陷阱」的實質評析〉，《思想教育研究》，7：75-79。
- 葉駿 (2019 年 10 月 3 日)。〈建政與建國的糾結〉，《中時電子報》。上網日期：2020 年 9 月 16 日，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191003004319-262105?chdtv>
- 樊水科 (2011)。〈從「傳播的儀式觀」到「儀式傳播」：詹姆斯·凱瑞如何被誤讀〉，《國際新聞界》，33 (11)：32-36。
- 劉致昕 (2019 年 7 月 25 日)。〈現代集中營——來自新疆「再教育營」的證言：電擊、老虎凳、監視性交的夫妻房〉，《報導者》。上網日期：2020 年 6 月 30 日，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xinjiang-re-education-camps-truth>
- 劉建明、徐開彬 (2015)。〈「儀式」作為傳播的隱喻之原因探析〉，《湖北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42 (4)：80-84。
- 蕭阿勤 (1997)。〈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35 (1)：247-296。
- 謝英傑、謝志淵 (2018)。〈對中共於「吉布地」設立首座海外軍事基地戰略意涵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52 (4)：121-139。 [https://doi.org/10.6237/NPJ.201808_52\(4\).0009](https://doi.org/10.6237/NPJ.201808_52(4).0009)
- 聶建中 (2020)。〈數位人民幣開啟數位貨幣暨電子支付金融之影響〉，《展望與探索》，18 (5)：1-9。
- 顏慧欣 (2019)。〈近期美中貿易戰發展動向之研析〉，《經濟前瞻》，182：9-14。
- 龔祥生、劉姝廷 (2019)。〈習近平對臺措施與成效評估〉，歐錫富、龔祥生 (編)，《2019 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頁 46-64。臺北：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
- Agence-France Presse. (2020, January 14). China trade surplus with US dropped 8.5% to \$296 bn in 2019. *Bangkok Post*. Retrieved September 15, 2020, from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1835484>
- Bennett, B. (2012). *Logically fallacious: The ultimate collection of over 300 logical fallacies* (Academic edition). Sudbury, MA: eBookIt.com.

- Blanchard, B. (2019, April 23). China shows off new destroyer as Xi views naval parade. *Reuters*. Retrieved October 12, 2019, fro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military-anniversary/china-shows-off-new-destroyer-as-xi-views-naval-parade-idUSKCN1RZ0AA>
- Bondaz, A., & Delory, S. (2019, September 24). The military parade for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C: A revealing example of Chinese strategic power. *The Fondation pour la recherche stratégique*. Retrieved December 1, 2019, from <https://www.frstrategie.org/en/publications/strategic-imagery/military-parade-70th-anniversary-prc-revealing-example-chinese-strategic-power-2019>
- Bradsher, K. (2019, October 17).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lows as Challenges Mount: The U.S. trade war is only part of the problem, as Beijing grapples with weakening investment and falling car sales.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September 15, 2020,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17/business/china-economic-growth.html>
- Carey, J. W. (1992).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han, M., Lau, S., & Ng, N. (2017, June 30). Hong Kong's PLA garrison stages biggest military parade in 20 years as Xi Jinping inspects troop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Retrieved October 5, 2019, from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2100671/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inspects-pla-troops-hong-kong>
- Chang, H.-p. (1997). *Taiwan: Community of fate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Munster, DE: LIT Verlag.
- Fisher, R. (2019, October 1). Arms racing with China: 70th Anniversary Military Parade, part 2: Intimidating Taiwan. *The Epoch Times*. Retrieved July 1, 2020, from <https://epochtimes.today/arms-racing-with-china-70th-anniversary-military-parade-part-2-intimidating-taiwan>
- Friedman, T. L. (2019, August 27). How Trump and Xi Can both win their trade war.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September 16, 2020,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9/08/27/opinion/trump-china.html>
- Goffman, E. (1957). Alienation from interaction. *Human Relations*, 10, 47-60. <https://doi.org/10.1177/001872675701000103>

- Hobsbawm, E., & Ranger, T. (Eds.). (2012).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lzschleiter, A. (2005). *Power of discourse and power in discourse: An investigation of transformation and exclusion in the global discourse of childhood*.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Germany.
- Hornby, L. (2016, April 3). China reverts to ‘grid management’ to monitor citizens’ lives. *Financial Times*. Retrieved July 1, 2020, from <https://www.ft.com/content/bf6a67c6-940e-11e5-bd82-c1fb87bef7af>
- Larsen, B. S. (2000). Radio as ritual: An approach to everyday use of radio. *Nordicom Review*, 21(2), 259-274. <https://doi.org/10.1515/nor-2017-0384>
- Nash, K., & Scott, A. (Eds.). (2001).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Oxford, UK: Blackwell.
- Osborne, M. J., & Rubinstein, A. (1994). *A course in game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Reisigl, M., & Wodak, R. (2001).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 Rhetorics of racism and antisemitism*. London, UK: Routledge.
- (2009).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pp. 87-121). London, UK: Sage.
- (2016).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3rd., pp. 23-61). London, UK: Sage.
-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Tokyo, Japan. (2017, November 6). *The White House*. Retrieved October 20, 2019,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prime-minister-abe-japan-joint-press-conference-tokyo-japan>
-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January 26). *The White House*. Retrieved October 20, 2019,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world-economic-forum>
- Rimmer, P. J., & Ward, R. G. (2016). The power of geography. In D. Ball & S. Lee, (Eds.), *Geography, power, strategy and defence policy: Essays in honour of Paul Dibb* (pp. 45-69). Canberra, Australi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Rothenbuhler, E. W. (1998). *Ritual communication: From everyday conversation to*

mediated ceremony.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chechner, R. (2002). *Performance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cott, R. E., & Mokhiber, Z. (2018, October 23). The China toll deepen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Retrieved November 13, 2019, from <https://www.epi.org/publication/the-china-toll-deepens-growth-in-the-bilateral-trade-deficit-between-2001-and-2017-cost-3-4-million-u-s-jobs-with-losses-in-every-state-and-congressional-district>
- Tao, I. (2019, July 13). Top US Officials meet with Hong Kong media tycoon critical of Beijing, much to China's ire. *The Epoch Times*. Retrieved September 15, 2020, from <https://epochtimes.today/top-us-officials-meet-with-hong-kong-media-tycoon-critical-of-beijing-much-to-chinas-ire>
- Taylor, A. (2017, October 13). Ditching deals has become Trump's main foreign policy.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November 2, 2019,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7/10/13/ditching-deals-has-become-trumps-main-foreign-policy>
- Trump, D. J. (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 Turner, V. (1995).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New York, NY: Aldine de Gruyter.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 van Gennep, A. (1961). *The rites of passage* (M. B. Vizedom & G. L. Caffee, Trans.).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9)
- Weiss, G., & Wodak, R. (2003).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Wodak, R. (2001). What CDA is about—A summary of its history, important concepts and its developments.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p. 1-13). London, UK: Sage. <https://dx.doi.org/10.4135/9780857028020.n1>
- (200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C. Seale, G. Gobo, J. F. Gubrium, & D. Silverman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pp. 197-213). London, UK: Sage.

- (2012). Language, power and identity. *Language Teaching*, 45, 215-233. <https://doi.org/10.1017/S0261444811000048>
- (201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C. Leung & B. V. Street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studies* (pp. 16-302). London, UK: Routledge.
- Wodak, R., & Meyer, M. (2009).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pp. 1-33). London, UK: Sage.
- (2016).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3rd., pp. 1-22). London, UK: Sage.
- Wodak, R., & Pelinka, A. (2002). From Waldheim to Haider—An introduction. In R. Wodak & A. Pelinka (Eds.), *The Haider phenomenon* (pp. vii-xxvii). London, UK: Transaction.

The Official Discursive Strategies of the Chinese Regime Toward the Parade i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C's Founding

Yen, Jui-Hu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discourse strategies Xi Jinping uses to convey his political intentions by examining the parade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rough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research examines self-reference, calls for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frame contests, and manipulation of ideologies from relevant texts. It finds that the core discourse revolves around “the absolut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and “the struggle to rebuild the order.” The main target audience of Xi's discourse is the Party,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aiwan being “disappeared.” In Xi's discourse, the most obvious “other” is the U.S. Xi Jinping has used patriotism, nationalism, people-centered ideology and globalization discourse to shape anti-American sentiment. In his strategy for Hong Kong and Taiwan, Xi has proposed a framework of “unity” and “peace” to fight against the “democratic system.” Xi Jinping manipulates spurious relationships and the other three argumentation strategies to distort history and consolidate his regime. The ideology thus constructed mainly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value,” “de-negotiation,” “de-continuity,” and “re-sovereignty” strategies.

Keywords: parade, discursive strategy,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ideology

* Email: gnumfather@gmail.com

Received: 2020.2.7

Accepted: 2020.11.7